

试论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思想

傅 山 源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转换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他认为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为了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博大精深,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简要论述。

一、时代主题的改变和世界格局的转换,迫切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 邓小平一直支持发展中国家为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而进行的斗争。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是帝国主义殖民时代的产物,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它在经济上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在政治上维护少数大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斗争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1964年3月,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首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通过了《77国宣言》,要求保护民族独立国家的合法权益,改变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同年10月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1974年4月,第六届特别联大召开,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强烈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主张,中国政府一贯给予大力支持。就在这次特别联大会上,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声明:“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①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甘地时曾谈及此事。他说:“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

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②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第六届特别联大终于通过了由“77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只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竭力阻挠，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处于明显劣势，加之发展中国家内部矛盾很多，致使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成效甚微。这一时期的斗争虽然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已明确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等一些直接涉及到改变国际政治旧秩序的问题。

2. 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邓小平一方面继续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在全面深入分析当今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改变了原先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③，以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等新的重大论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就意味着实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为完成这两大任务，必须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因为：第一，战后形成的以美苏的长期对抗和强权政治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旧秩序，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在这种旧秩序下，美苏互为对手，相互角逐，在全球范围内争霸。他们控制和操纵国际事务，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使国际局势长期处于紧张之中。进入80年代以来，以美苏关系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从以激烈的冷战对抗为主转变为以全面竞争与对话为主，整个世界形势呈现缓和的势头，但是美苏双方对世界的争夺并没有停止，军备竞赛仍在继续，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必须彻底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秩序。第二，战后存在的以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和剥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对人类共同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的最大障碍。少数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剥削和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停滞或倒退，社会长期贫困落后，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为了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必须彻底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邓小平善于把握世界全局，他在继续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又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并认为两者应当同步进行。就在1988年和拉·甘地的那次会见中，他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④1989年10月，他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再次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⑤

3.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前后，邓小平更强调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开始，接着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局势激烈动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频频得手，国际力量对比不断地向西方倾斜。他们兴高采烈，踌躇满志，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粗暴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到处插手，制造动乱。针对国际形势出现的这种新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强权政治在升级和另外两个冷战的论断，他说：“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就体现出来了”^⑥。又说：“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⑦他精辟地分析了美苏关

系缓和后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⑧邓小平不仅指出了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而且深入分析了在多极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国际形势特点:即由于全球性的力量失衡和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国际关系中的矛盾增多了,而且新旧矛盾互相交织,使世界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变幻莫测。他说:“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⑨强权政治在升级,另外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以及由于两极格局解体打破了旧的国际力量平衡,使过去长期被抑制和掩盖着的许多矛盾和争端在多极化过程中突现出来,导致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不断发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和平与发展仍然遭受着严重威胁,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这两大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因此,邓小平一再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为实现和平与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邓小平强调“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有所作为”^⑩,其根本目的正在于此。

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也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因为两极格局终结是在一个超级大国崩溃解体,另一个超级大国力量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发生的,美国在苏联消失后无力形成独霸天下的一极格局,包括西欧(德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在内的多种力量纷纷崛起,东西矛盾迅速上升,南北矛盾更加突出。与此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日益密切;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的高涨,以经济技术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破除旧的、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然而由于东欧剧变,苏联动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对当今世界形势、中国的处境和前途以及社会主义的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悲观怀疑论调,为此邓小平指出,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⑪。这里虽然是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要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善于利用国际环境对我有利的方面,加快经济发展,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但推而广之,对于我们把握机遇,利用矛盾,抓住有利条件,积极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随着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世界向何处去,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不仅关系到各国的利益和发展,而且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它自然成了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原先顽固维护国际旧秩序的西方大国,眼看着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计,他们转守为攻,提出了各种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设想。其中美国鼓吹的、由他一国领导的、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最具代表性。日本和西欧国家尽管不同意美国的主张,提出由几个大国共同主宰世界的国际新秩序,但他们在力图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起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所谓国际新秩序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显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的国际新秩序,不过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在新形势下的改头换面而已！如前所述，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贯主张建立世界上所有国家平等参与的国际新秩序。80年代末以来，由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更迫切要求改变国际旧秩序，建立真正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为第三世界重要成员的中国，率先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还在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就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⑧1988年，他在和拉·甘地会谈时再次指出：“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⑨。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印两国当时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搞好国与国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⑩在东欧剧变、苏联动乱、以及西方大国对我国实施制裁后，邓小平更加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

2. 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中，互不干涉内政是核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是基础；平等互利是其在处理经济关系方面的体现。今日世界是一个存在各种差异的多样化世界。各国之间不仅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各异，而且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也有很大差别。只有承认这些不同，相互尊重，才能扩大合作，发展交流，和睦相处。然而少数热衷于搞霸权的大国，凭借他们的实力地位，强制推行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给予援助、进行合作的条件。如果遭到反对和抵制，就要对有关国家实行封锁和制裁。对此，邓小平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⑪他提醒西方，如果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将会引起国际局势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他揭露西方世界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控制这些国家，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竭力煽动和大力支持，1989年北京地区发生了动乱。这场风波平息后，他们又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对这种公然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放肆干涉我国内政的霸权行为，邓小平作了深刻揭露和谴责，并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正立场。他还揭露了西方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动乱并力图用和平演变的手法使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险恶用心。他警告西方，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煽动动乱将会带来世界性的灾难。因此，“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⑫

西方世界借口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宣扬所谓“主权淡化”、“人权高于主权”等论调，并采用各种手段损害别国主权，侵犯别国领土，甚至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迫使其他国家屈从其旨意。对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一贯欺侮第三世界国家的罪恶行径，邓小平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以中国为例告诫来访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⑬北京动乱平息后不久，他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⑭他声明：“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⑮

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存在严重困难，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经济旧

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平等互利的原则,对于协调国际经济关系起着重要作用。

李鹏总理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各自所处的地位,及其在国际新秩序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概括,指出:“互不干涉内政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际新秩序的核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这是五项原则和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平等互利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经济关系方面的体现”^②。

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邓小平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因而越来越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三、全世界人民积极行动起来, 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奋斗

遵照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 14 大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要完成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在当前需要大力进行以下工作。

1. 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战后建立的国际旧秩序是以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邓小平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③苏联解体和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国际局势虽总的趋向缓和,但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和平与发展仍然面临严重挑战。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必须继续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当前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还是继续维护国际旧秩序的斗争,是反对还是继续维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正是基于对未来国际形势的深入分析和科学预见,还在 1990 年 3 月(当时离苏联解体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邓小平在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对两极格局结束后未来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作出了正确判断,并重申:“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他强调:“这两条要反复讲。”^④这两条是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和平与发展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根本目标;而要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和平与发展,又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邓小平认为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斗争。1989 年 11 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由于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对非洲的长期统治和剥削,非洲国家的解放和发展不是几年能够解决的,需要更多的艰苦奋斗。但是鉴于世界迅速向多极化推进,改变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已是众望所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邓小平又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邓小平十分注意斗争策略,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在坚持反霸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活动,广交朋友,争取多数,利用矛盾,趋利避害,尽可能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他在 1986 年 3 月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谈到:“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

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⑤1988年，他对来访的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说：“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⑥这两次谈话，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对外战略和策略思想。北京动乱后，针对西方对我施加的强大压力，他一方面强调我们绝不能示弱，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另一方面又告诫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对西方国家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东欧剧变，苏联动荡，西方加紧对我实施制裁，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邓小平在强调“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的同时，再次指出：“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⑦他还表示，我们在原则立场上决不让步，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问题。

2. 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邓小平指出，在当今时代两大问题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其中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为要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南北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少数发达国家依靠国际经济旧秩序，垄断世界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科学技术，剥削和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为摆脱自己的困境，竭力向南方转嫁危机，从而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邓小平强调南北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北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南方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他认为，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是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已发展相当高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已紧密地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如果南方国家得不到发展，那末北方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因为北方国家的资本输出和商品销售，有赖于作为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的南方国家。今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存在的最大问题—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就是和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密切相关的。邓小平正是从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日趋扩大，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出发，深刻指出南方国家的发展，不仅是使这些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他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⑧既然发展是南北双方的共同责任，那末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南北矛盾，建立国际新秩序，自然是最好的方式。反之，南北双方如果采取对抗的形式，只会对各自的发展都不利。所以邓小平说，解决南北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⑨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南北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因此，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要通过南南合作来推动南北关系的改善。

对于南南合作，邓小平寄予很大的热情和希望。他说：“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这些年来第三世界有一些发展，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这种合作总能解决一些问题。”^⑩他满怀信心地预言：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总之，南南合作对于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独立，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南方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推

动南北关系的改善,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都具有重要作用。

3.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认为任何一个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要获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这些国家独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然而现存的国际旧秩序严重阻碍着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为改变这种局面,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采用了各种斗争形式,通过对话解决矛盾即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南北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和发达国家的顽固抵制,南北对话和合作取得的成果很少,国际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仍旧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他们依然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鉴于此,邓小平在肯定南北对话与合作的同时,强调指出:“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他又说:“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②,要坚持对外开放。他恳切地忠告来访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要抓住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③;“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④。他还实事求是地向外宾介绍我国发展经济中的经验教训,以期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他在1992年春天巡视南方的谈话中指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虽是对我国领导人说的,但同样也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第三世界最大的国家。邓小平期望中国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以及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上,作出更多的贡献。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我国能有更大的发展,经济建设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他说:“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⑤他预计到下一个世纪的50年,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⑥。他满怀豪情地表示:我们就是有这个雄心壮志。

两极格局结束后的当今世界形势,为国际秩序的“破旧立新”,既提出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全世界人民要积极行动起来,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

注 释:

① 《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②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283、127、282、328、329、345、344、363、363、354、96、283、360、361、289、348、328—329、56、353、156、260、359、282、56、20、282、270、289—290、233页。

⑬ 《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4日

⑳ 《李鹏总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6月28日。

㉔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04页。

(责任编辑 叶娟丽)